

日據時代

台灣新文學的特性

——兼談研讀應有的認識

黃武忠

臺灣由於地緣關係，隔着臺灣海峽，形成中國版圖裏一個孤懸海外的島嶼，因為環境的影響，使臺灣沾染了若干海島文化氣息。再加上三百年來，於開發的過程中，曾遭異族統治，以中國文化為主流的臺灣文化，難免遭受異族文化的影響，造成若干的特殊性，這種現象自然也會反映在文學作品上。

壹、臺灣新文學的特性

乙未割臺之後，日本統治整個臺灣，實施高壓手段，意圖切斷臺灣與中國大陸間的文化臍帶，其間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由日人坂垣退助伯爵來臺組織「臺灣同化會」，進行其同化手段，並於民國廿七年（一九三八），為配合戰時體制，由小林總督提倡皇民化，復於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成立「皇民奉公會」，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試想把臺灣改頭換面，變成日本帝國主義下的順民，以便利其統治。然而，臺灣人的民族意識根深蒂固，抗日的浪潮洶湧澎湃，前仆後繼，其無畏犧牲的抗日事跡，可歌可泣，史不絕書。在前期的武力抗日節節失敗後，仍舊不為所屈，乃轉向地下，改為非武力抗日，從事「新文化運動」。

臺灣新文化運動的產生，一面是受祖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一面是受世界潮流的新的撞擊。尤其在武力抗日失敗，投訴無門的當時，藉着文化運動的鼓吹，喚起民衆的民族意識，是一條比較可行的途徑。因此，當時大多數的知識份子，都紛紛投入這個行

列。

而臺灣新文學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支流，由於它負有特殊使命，使整個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壇形成了特殊性格。當時的作家意識到，要使臺灣文學能長久發展下去，必須在政治的狹縫中，尋求一條生存的路線。王錦江（王詩琅）先生說：

「但是我們知道，臺灣是世界的一隅，所以它的文化生活一面是和世界共通的。然一面却有它的特殊狀態和傳統。在這社會裏的人，不論是誰，都不能逃出它的影響。所以我們切實底要求的，是正確地認識把握在繁雜的臺灣之特殊情勢下發展着的社會現象和它的歷史性及適合這現實的理論。」（註①）

王錦江先生呼籲當時的臺灣作家，應認清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在殖民地統治之下，發展一種適合於現實的文學理論路線。描寫日人欺壓臺胞的真實面貌，以文學活動為名，進行抗日之實。

此時張深切先生也對臺灣新文學路線提出看法，他說：

「我所要主張的是臺灣新文學不要築在於既成的

任何路線之上，要築在於臺灣的一切「真、實」（以科學分析）的路線之上，以不即不離，跟臺灣的社會情勢進展而進展，跟歷史的演進而演進，就是。」（註②）

張深切主張：臺灣新文學要建築在客觀的「真、實」層面上，換句話說，臺灣新文學應走寫實路線，把臺灣人的真正遭遇，透過文學的筆調，一一紀錄下來。亦即是把日本統治階級壓榨臺灣人民的事實，表露給多數的民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藉着「真、實」的紀錄，讓臺灣人覺醒，以春秋之筆揭露日本人的欺詐手段。

所以當時臺灣知識份子所尋求的路線，是以「真、實」的寫實主義做為新文學的路線，因此被凌辱、壓榨的農民、小市民，便成為作家筆下的題材。假如把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簡略地分為萌芽期、奠基期和決戰期，則可看出日據下臺灣文學作品所呈現的特色，有其層次上的差異。分述於后：

（一）萌芽期：這個時期因剛從激烈的武力抗日，轉為非武力抗日的初期，以文化手段來從事一些覺醒運動，日本當局似乎較為放鬆，所以此期的作品充滿着

強烈的民族意識。如：①賴和、陳虛谷等，其作品所反映的，是持着尖銳的抗議精神，甚至有犧牲之決心。②楊守愚的作品，雖持尖銳抗議的態度，但已有社會主義的傾向。③楊雲萍與蔡秋桐的作品，則偏向於冷諷熱嘲。

（二）奠基期：此時期是臺灣新文學的豐收階段，作品產量甚鉅，受日文教育的臺灣青年已能用日文寫作，甚至有些作品足以和日本作家分庭抗禮。這個階段的作品，帶來了知識份子的覺醒。如：①楊達的作品，仍然承繼楊守愚的社會主義傾向，從事尖銳的抗議。②巫永福的作品，充滿了對祖國懷思的呼喚。③楊華的作品，則在尖銳的抗議之後，趨向於絕望與悲觀的心態。

（三）決戰期：此時中、日戰爭已經爆發，雖然臺灣是日本佔領的殖民地，但日本人仍視居住在臺灣的中國人為敵人，因此一再的使用強制手段，利用臺灣青年充當炮灰。尤其是在思想上的箝制，更加厲害。日本當局提倡「皇民化」，幾乎所有純正的文藝雜誌，皆呈停頓狀態，所以這個階段的作家，其作品已少有正面的激烈抗議。如：①呂赫若的作品，呈顯冷眼旁

觀的態度。②龍瑛宗的作品，表現知識份子的蒼白，走向悲頹的意識形態。③張文環的作品，則趨向於涵容的態度，他似乎認為以中國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任憑帝國主義利用種種手段想加以同化，終究會是徒勞而無功。④吳濁流則走向了「地下文學」，偷偷地創作「亞細亞的孤兒」。⑤鍾理和却是流亡於中國大陸的作家，真正呈現了隱忍的精神。

由上所述，我們知道殖民地統治下的臺灣文學，呈現了多種特色，林載爵先生曾說：

「身為知識份子的作家，一開始就背負了沉重的民族意識的十字架，舉目望去，是被凌夷的同胞、歧視的眼光和愚蠢的習性，儘管『社會現實性』這個路線問題一直被討論着，但到民國三十年止，臺灣作家的作品裏，是充滿着社會意識的，很少逃避現實，遁入虛妄的王國裏。大多數的作品，所描寫的是窮苦、樸實的農民，和他們在剝削下的生活，或者日本警察的暴惡嘴臉，御用紳士、走狗的面目等等殖民地的現象。大多數的作家都能將自我的價值歸結到社會大眾上，社會的災難就是個人的災難，周圍人民的不幸就是個人

的不幸，藉着作品表達對現實社會、政治的抗議精神，或是對不可抗拒之外加災禍的剛毅的隱忍精神。」（註③）

這段話明白的告訴我們，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作品，呈現了兩種精神：一是「抗議」，一是「隱忍」。然而日據時期的文學精神，除了林君所言之「抗議」與「隱忍」二端之外，就其實質作品而言，尚有楊雲萍、蔡秋桐的嘲諷，呂赫若的冷觀，龍瑛宗的悲頹，張文環的涵容……等，都是值得注意的。這是殖民地體制下所產生的文學特質，也是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特性。

貳、臺灣新文學的多面性

日據時代的臺灣新文學，所以會有這種特殊性，是因為客觀因素所造成，這種客觀因素就是日本的殖民統治，實施了皇民化政策，旨在同化與愚民。因此在帝國主義下，日本當局採取軟硬兼施、威脅利誘的手段。在這種情形下，有血氣的青年，奮不顧身，積極地抗日，以筆代劍，實施口誅筆伐的實際行動。也有人採取比較消極的態度，偷偷地紀錄，發生在自己

同胞身上的慘酷事實，以真實的態度，寫出血淚交織的文學，表面上看來是「隱忍」，但事實上是對日本統治者的隱性抗議。還有一些意志不堅的人，走投機路線，甘爲日人效命，當起御用紳士，寫出奉承阿諛日本當局的「皇民文學」，因此使日據下的臺灣新文學產生了多面性。葉石濤先生說：

「在這動盪不已的殖民地社會裏，作爲臺灣的一個智識份子，縱然他思路不清，無法正確地抓住歷史和社會巨大的趨向，但他仍會有許多深刻的感觸的；究竟人是社會環境的動物，他的思考脫不了外來世界的影響。眼看臺灣人喪失自由，過着被人凌辱的生活，當時的智識份子只有兩條路可供他們選擇；直接地參加政治活動，抵抗日本人，保持民族的驕傲，抑或向現實低頭，訓練自己成爲『御用紳士』以求令人不齒的榮華富貴。」（註④）

日據時代的臺灣智識份子，所面臨的抉擇，是要有強烈的民族情感，和堅定信心的，否則只有不顧同胞，做一位現實社會中的瞎子，尋求自己賣國求榮的生活。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日據時代的臺灣新文學，有所謂「抗日文學」與「皇民文學」產生，在此複雜的環境中，有時很難分清界線，光復後的現在，於資料蒐集不易的情況下，想去瞭解他們並非易事。所以難免有些作家遭受誤解，或許也有些人搖身一變，却成了抗日功臣。吳濁流先生有所感觸的說：

「我說：歷史很多漏洞。如光復後，很多人偽造歷史，我們知道，日政時代的御用紳士是日人的走狗，因爲他們有錢，或是他們的子孫會宣傳，一躍變爲愛國份子的也有；反之，許多真正的志士都埋沒在地下，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文獻委員會，須要慎重調查發掘真正的資料。」（註⑤）

資料的蒐集與調查不只是文獻會的事，是大家的責任，然而分辨忠奸，是每位臺灣文學工作者所應有的認識。

有關日據時代臺灣文學作品資料的蒐集與整理，目前已有點成績。已出版「日據下臺灣新文學選集」（李南衡編，明潭），「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鍾肇政、葉石濤主編，遠景）兩套書。這兩套書的出版

實在給研究者很大的方便，至少我們可以讀到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作品，窺其本來面目。「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的出版宗旨說：

「臺灣同胞以武裝或非武裝抵抗日本帝國侵略五十年，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具沉雄悲壯的一章。日據下的臺灣新文學運動，不僅是中國抗日的民族文化鬭爭的一環。過去三十多年來，此段光榮的歷史，一直受到忽略或誤解，這是人類的悲憾。爲澄清誤解，不使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再蒙塵含垢，我們以嚴謹慎重的態度，對歷史負責的精神，歷經多年的蒐輯、整理、翻譯和註釋，編成這套小說全集八卷，期望被封塵多年的光復前臺灣新文學，能獲得世人的重視，以釐定它在中國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這是我們編輯的宗旨與動機。」（註⑤）

編輯者的苦心與出版者的魄力，使這些作品得於重見天日，其精神令人敬佩。

日據下臺灣新文學作品的蒐集編印，是提供研究的最佳依據，目前資料雖不是十分完整，但比起以前實在豐富多了。現在應該是起步研究推介，並加以評

斷的時候，使部分蒙塵含垢的作品，能早日重現光澤。

叁、臺灣新文學被誤解的

原因

作爲一個臺灣文學的愛好者，對於這一段複雜、特殊背景下的文學作品，在研讀時自然要分辨真、偽、虛、實，認清忠奸，而後使真正好的作品脫穎而出，並釐定它在整個文壇的地位。如此才能使沒價值的御用作品受到應有的指責，而使蒙塵的作品重現光澤。那麼要如何才能使蒙塵的作品不被誤解呢？首先要探討這些作品被誤解的可能原因。筆者以爲：

（一）日政當局的同化政策：日本以統治者的地位佔領臺灣，其目的在於消滅臺人的民族意識，以達其同化的理想，最好是讓所有的臺灣人都能心悅誠服地做一個低一級的日本人。因此實施高壓手段，鼓勵臺人穿日本服、姓日本姓，有些人爲了求生存不得不聽其擺佈，而改姓日本姓，但大多還拖着民族意識的尾巴；譬如姓呂的改寫『宮下』，這是由字型而來的，宮字下部不是呂字嗎？又如陳姓改作『穎川』，黃姓改

作『江夏』，這都是由祖籍的地名而來的，表面上雖然是日本式一點，事實上只是把『堂號』拿來作姓氏用而已。」（註⑦）假如我們以為他改了日本姓氏，就肯定他是日本順民，而指他是漢奸，所寫出來的文學就是御用文學，那是不太公平的。我們必須從他的思想行動中去考察，從作品中去探究，才不致於造成誤解。

（二）皇民奉公會的有意推捧：民國廿六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臺灣同化政策的推行更是積極。組織了「皇民奉公會」，設立「皇民文學賞」，鼓勵臺灣作家創作皇民文學。吳濁流先生說：「傀儡式的文化會產生傀儡式的青年，臺灣總督府的官兒們為推行這種傀儡式文化，曾經賣過力氣，從世界水準看來雖是幼稚也誇獎為天才而煽惑他們。不僅如此，連日本水準都沒有達到的也加過份的獎勵。因此，本省有識之士都稱『天才』為『天災』。」（按天才與天災日語諧音）（註⑧）可見日本當局對臺灣作家如何的蓄意推捧，以達其宣傳的目的。在那種時局之下，不敢說沒有應聲蟲，大寫皇民文學，但是也要注意，有些作家根本就沒有寫作皇民文學的意念，但作品刊登之後

，却被日本當局有意的利用，奉為皇民文學的主臬作品，而造成天下人的錯誤印象。

（三）以日本文化觀點來看臺灣文學：日本人以日本文化的本位主義來取捨、評斷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因此有時真正代表中國文化的作品就被犧牲，而適合日本文化立場的文學作品就被推崇，如此的論斷當時作品，就很難客觀公正。真正好的作品難免蒙受塵垢，不見得優秀的作品却榮登寶座，倘若後人不察此點情況，就容易有不正確的評斷，尤其日人所修的臺灣文獻資料更不可靠，有的甚至歪曲篡改。例如：臺灣的抗日事跡，在日人的筆下竟成「臺灣匪誌」，抗日英雄竟成土匪，完全是站在日人的文化觀點來看臺灣的一切，所以有心人必須明察。

以上三點，可能是造成後人誤解部分臺灣新文學作品的重要因素，在研讀日據時代作品時實不可不多加注意。

肆、研讀臺灣新文學應有的認識

近年來，研究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的人漸漸增多

，不但作品被輯印成書，當時的報刊雜誌也被影印重刊，研究起來較以前方便許多，但研究作品時需要有所認識：

(一)瞭解作家的生平事跡：這是研究文學作品之前，必做的工作。假如對作家的生平、生活背景、社會狀況、以及所參加的各項活動不瞭解的話，對其作品的研究，便無法深入，可能流於浮面，有時甚至無法體會其個中奧秘。古人有云：「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欲研究日據下臺灣新文學作品，而不瞭解當時作家的狀況是不行的，不但不能給予適當的評價，反而會造成誤解。例如：有一位作家，曾把張我軍、張深切列為抗戰時期的落難作家，就犯了此一毛病，他當時可能不瞭解張我軍和張深切都是臺灣人，才會做下那種結論。我們看一下張深切先生在「槍刺刀下的幾篇小議論」的引言，他這樣寫着：「下面幾篇的小文章，都是日本還占據大陸時代，筆者曾在北平發表過的，處在敵人的槍刺刀下，能寫些什麼？大概可想而知；然而筆者仍不願意放棄筆墨，自解武裝；因為放棄了筆墨，便無一物可以打擊敵人，所以明知在敵前舞文弄墨，等於老鼠戲貓公，好弄險，甚則還會招

致殺身之禍，但義不容辭，只得避重就輕幹下去；果然，到了民國三十四年四月，筆者就被日寇一四二〇部隊抓去險些兒槍決了。當時筆者費盡心思，極欲告訴我淪陷區的同胞是：我們雖然戰敗，切不可駭怕，勝負絕不能決定民族的興亡，戰爭好像暴風雨，是短暫的，一過去就會恢復常態，只要我們能保持偉大的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自有復興的機會。」（註⑨）他會是落難作家，會是日本的御用紳士嗎？實在值得商榷。因此作家的生平事跡，必先考查研究，以幫助對作品的瞭解。

(二)文學作品應與史籍文獻並讀：光讀文學作品是不够的，必要與史籍或文獻資料併讀，才能瞭解其全貌，而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否則只能略懂皮毛而已。例如：在日據時代有些人常結交日本當局的人，彼此唱遊。假如我們就此以為他是奉承日本人的御用紳士，是很容易犯錯的。我們看林獻堂先生紀念集裏的記載，林獻堂先生於日本會見梁任公時，曾對臺胞爭取自由一事，向梁任公有所請益，任公告先生曰：「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臺人爭取自由。故臺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供無謂之犧牲。最好效倣

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臺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份壓迫臺人。」（註⑩）此一席話對林獻堂先生影響很大，使他的抗日思想趨向於較為理性、溫和的路線。這是使別人不入地獄，而自己先入地獄的偉大作法。假如我們不參讀文獻資料，對此改變他一生的話，自然不得而知，而誤解其為人，甚至曲解作品。

（三）以中國文化的觀點重審臺灣新文學：日據時代的臺灣新文學作品，有中文和日文兩種，雖然都是用日本文字寫成，但他的題材是中國人的題材，仍然是屬於中國的作品，這是我們首先應知道的。在當時日本人用日本文化的觀點來衡量作品的優劣，自然有所偏差，現在我們必須以中國文化的觀點來讀它，並把每位有貢獻的作家，以整個日據時代的文壇來測量，給他一個適當的地位與評價，使真正好的作品能夠獲得重視。

日據時代的臺灣新文學，無疑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部分，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應有其價值與地位。臺灣在日本的統治下五十年，歷史遭人篡改，而文學作品乃是較為真確的紀錄，實有彌補歷史資料不足的

功用，特值得重視，並加以有系統的整理研究。

註釋：

- ① 參閱「一個試評——以臺灣新文學為中心」，王錦江作，「臺灣新文學」一卷四號，一九三六、五、四。
- ② 參閱「對臺灣新文學路線的提案」，張深切作，「臺灣新文藝」二卷二號，一九三五、二、一。
- ③ 見「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林載爵作，「中外文學」，六十二年十二月號。
- ④ 見「吳濁流論」，葉石濤作，（已收入「葉石濤作家論集」，三倍，六十二、三、廿九）。
- ⑤ 參見「歷史很多漏洞」，吳濁流作，「臺灣文藝」第二期，三十五、五、一。
- ⑥ 參見「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遠景，頁一。
- ⑦ 參見「半路出家集」，葉榮鐘作，中央書局，頁二〇九。
- ⑧ 參見「黎明前的臺灣」，吳濁流作，遠行，頁九四。
- ⑨ 參見「我與我的思想」，張深切作，中央書局，頁一〇〇。
- ⑩ 參見「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頁十五，編者葉榮鐘編，省文獻會。